

# 抗美援朝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

靳道亮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抗美援朝加速了知识分子教育改造进程: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使知识分子的改造由谨慎走向急迫,由松散的政治学习转为组织化的政治教育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抗美援朝运动在政治、文化层面清算了美国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1951 年秋,抗美援朝的顺利进展及其引起的国内形势变化,既向中共提出了发起思想改造运动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也为思想改造运动创造了条件,使知识分子的改造由政治层面转入思想层面。从规范知识分子对美国的认识,到批判知识分子的美国观,再到清算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观念,中共通过抗美援朝整合知识分子思想的成功,既建立在把民族主义融入阶级范畴的“爱国必须联苏反帝”的政治逻辑之上,也建立在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心理基础之上。

[关键词]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民族主义;社会动员

[中图分类号]C912.67;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6)04-0152-09

教育与改造知识分子是中共执政后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便纳入国家建设日程。1949 年至 1952 年,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经历了政治学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思想改造运动等阶段,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这一过程中,抗美援朝与土地改革等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土地改革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影响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关于抗美援朝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教育改造的影响尚缺乏系统研究。现今学界的相关研究,多注重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共对知识分子亲美、崇美等思想的清理,抗美援朝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进程的具体影响、尤其是 1951 年开始的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具有决定意义的思想改造运动与抗美援朝的关系等问题均着墨不多,尚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sup>①②</sup>事实上,抗美援朝不仅加快了知识分子教育改造进程,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其他社会改造运动的重要动力。1950 年至 1952 年,中共为巩固新生政权发动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都与抗美援朝紧密相关。周恩来曾讲过,抗美援朝“对我们国家各方面改造和恢复的工作起了伟大的推动作用”,“抗美援朝运动实际上保证并促进了我们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的事业的早日胜利完成”。<sup>[1]</sup>鉴于此,本文拟把抗美援朝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教育改造的进程相结合,深入讨论在知识分子教育改造过程中抗美援朝运动发挥的具体作用以及作用机制,分析抗美援朝推动国内社会改造的内在逻辑,管窥爱国主义、战争动员在国内政治整合、社会转型中的重大作用,为深化新中国头三年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提供一得之见。

## 一、抗美援朝前中共对知识分子教育与改造的运思

团结、教育与改造知识分子是中共在夺取政权前后既定的政策与目标。自 1948 年上半年开始,随着中国革命胜利的到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如何对待各级各类知识分子问题发出了一系列指示,提出对解放区

① [收稿日期] 2016-03-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抗美援朝与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研究”(13CDJ013)

[作者简介] 靳道亮(1974—),男,河南南阳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当代中国史。

② 关于抗美援朝运动对知识分子思想影响的研究主要可见于凤政著:《改造:1949—1957 年的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张济顺著:《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1943—1953》,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崔晓麟著:《重塑与思考——1951 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年版;杨玉圣著:《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金达凯著:《中共的思想改造》,香港友联出版社 1954 年版,等等。

的知识分子,一面要使用,一面要教育和改造他们。<sup>①</sup> 这为中共执政后如何对待知识分子提供了基本指导思想。1949年9月,这些政策思想写入了新中国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之中。《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人民政府将对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同时对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开展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的需要。<sup>[2]11</sup>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12月30日,教育部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钱俊瑞在会议上指出:“新区教育工作的关键是争取团结和改造知识分子”,对于一般知识分子应尽量争取他们,只要他们愿意服从政府法令,就可以让他们出来工作,然后办“各种训练班,训练技术和政治,慢慢改造他们”。他引用毛泽东的话,强调应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sup>[2]90</sup> 很明显,中共在执政前后,已经开始把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提上了国家建设日程。

虽然教育与改造知识分子已经纳入新政权施政纲领,但在朝鲜战争爆发前,鉴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政治形势,中共仍以团结知识分子反帝反封建为主,不但对旧知识分子的政策和态度极为谨慎,而且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采取了政治学习、思想总结等温和的方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1948年发布的有关知识分子的指示反复强调对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最冒险政策”<sup>[5]1269</sup>,“必须采取慎重态度”<sup>[3]1269-1270</sup>,对仅仅是思想上反动的学生、教员和知识分子,应通过其中的进步分子,“从思想上去说服教育改造他们”<sup>[4]229</sup>,对高级知识分子,“与其采用急进而冒险的政策,不如采取稳扎稳打的政策,先维持然后慢慢改进”<sup>[4]240</sup>。根据上述政策思想,自1949年2月开始,在京津沪宁等新解放区的高等学校,中共相继组织高校师生参加政治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促进师生改造思想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点、阶级观点、土地改革原则和社会发展规律。知识分子的思想总结也随之展开,许多教授在报刊上发表了自我检讨和自我批评的文章。华东、华北还专门分设了革命大学,吸收一批旧知识分子进校学习;经过自我反省与思想总结,他们在这里结业后,被安排参加革命工作。政治学习和思想总结等方式,没有压力,形式松散,没有规范,是温和的改造手段,较好地反映了中共“稳扎稳打”和“慎重”的思想。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仍小心谨慎。1950年5月29日,毛泽东在谈到高等教育工作时仍强调“教育要改革,要变,但是不要急,要有步骤地变,一个时期可以少变一点”,教会学校的政治课“暂时维持原状,实际上放松一点”,“在这方面发动攻势要谨慎,不要使自己陷于被动”。<sup>[5]139</sup> 6月6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交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再次强调,在对旧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改革的问题上,既不能拖延时间不愿改革,也不要“过于性急的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sup>[6]71</sup> 在毛泽东看来,“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缓和,要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sup>[7]52</sup> 正是认识到思想改造的艰巨性,毛泽东曾特别强调,在全国28所教会学校里,对“猴子变人”的唯物主义原理的教授,要有灵活性,不要硬性教授。<sup>[8]21</sup> 显然,抗美援朝前,中共一直把知识分子教育改造视为一个长期渐进的艰巨过程,主张有步骤谨慎地改造,反对急躁粗暴的方法。

然而,这种谨慎稳健的教育方式与改造政策却很快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改变。朝鲜战争发生后,中共便组织知识分子参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社会政治运动中,推进了知识分子教育改造进程。

## 二、抗美援朝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政治教育与思想斗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10月19日,为了捍卫新生政权的安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志愿军的名义入朝参战,抗美援朝由此开始。

为了消除朝鲜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恐慌心理和动员国内民众支持战争,中国国内迅速开展了一场抗美援朝社会动员运动。10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要求全国人民应对“美帝国主义”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sup>[9]139</sup> 由此,以“三视”教育为开端,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

由于知识分子被认为是崇美、亲美和恐美的群体,加快对知识分子旧思想的改造成为迫切需要。中国民

<sup>①</sup> 参见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年1月18日),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9-1270页;《中央批转陈克寒关于新宣传工作与争取青年知识分子致新华社总社电》(1948年7月3日)、《中央关于临汾地区工作方针给晋绥分局等的指示》(1948年7月3日)、《中央宣传部关于新收复城市大学办学方针的指示》(1948年7月13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231、239-241页。

盟实际领导人胡愈之撰文指出,在抗美援朝运动面前,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集团,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工作是对工商界和一般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斗争,并号召“为进行爱国的国际主义的思想教育而斗争;为反对民族失败主义和恐美思想而斗争;为清算一切亲美崇美思想而斗争;为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而斗争!”<sup>[10]57-59</sup>这一号召表明,在知识分子中开展抗美援朝的主要任务,是清算美国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等新社会价值规范。

为达到上述目的,知识分子首先被组织动员起来参加时事学习。以教育界为例,抗美援朝运动中,北京大学教师全部参加了时事学习。<sup>[11]3</sup>南京大学师生3 000余人,从1950年11月17日起开始学习时事形势;12月,南京大学又停课3周,开展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sup>[12]</sup>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知识分子也参加了街头宣传活动。1950年12月2日,南大师生1 000余人,分为30多个队走向街头及郊区展开抗美援朝宣传。参加宣传的教授人数之多,为解放以来历次大规模宣传运动所罕见。<sup>[13]</sup>1951年4月,在《人民日报》发出“必须使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教育”号召之后,仅北京市就动员了35 000多名学校师生和18 000多名积极分子深入到各工厂、市区街道和城郊农村,对200多万民众开展了抗美援朝爱国主义宣传。<sup>[14]33</sup>

对知识分子而言,参加抗美援朝时事学习与宣传,是一种与前述政治学习明显不同的自我教育与改造的方式。抗美援朝宣传教育是有计划、有系统的以“三视”美国为重点内容的政治教育,具体内容是要求做到“三认清”与“三确立”,即认清美国民主的欺骗性和它的帝国主义本质,以确立“仇视美帝”观念;认清美国思想文化的腐朽和生活方式的堕落,以确立“鄙视美帝”观念;认清美国的反动本质与经济军事力量不断下降的趋势,强调原子弹并不可怕,以确立“蔑视美帝”观念。<sup>[15]203</sup>同时,这种对美国认识的规范化,又融入了新政权的价值体系与政治要求。在抗美援朝宣传教育中,反美被纳入包含国际主义的新爱国主义范畴,人民政府的宣传部门提出“反美就是爱国,爱国必须反美”,“或者联合苏联,或者联合帝国主义,二者必居其一”,成为爱国与卖国的界限,<sup>[16]</sup>“赞成不赞成抗美援朝的问题也就是爱不爱祖国的问题”,<sup>[17]65</sup>由此,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切入点,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阶级利益、民族利益统一起来。抗美援朝中关于民族主义的含义,已经不仅仅具体化为摆脱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和打败“美帝野心狼”,还包含了联合苏联等“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向“美帝国主义”斗争的现实政治要求。这种把阶级观念、新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建立在反美政治需求基础上的学习,由于和百年来民族独立的目标结合在一起,更可能在民族主义情绪下被知识分子所接受。

在参加时事学习和宣传的同时,知识分子也被要求参与反美宣传理论上的构建。那些有留学欧美背景的人个别地或集体地从事有关抗美援朝书刊的编写,根据自己的经历,从各个方面批判美国。仅以1950年11月《新华日报》刊登的文章为例,就有: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的《美帝对华侵略的剖视》(11月16日)、杨宪益的《鸦片战争与美国》(11月16日)、韩儒林的《太平天国时代美帝给予中国人民的灾害》(11月20日)、史国纲的《美帝怎样与中国人民为敌》(11月20日)等10多篇文章。1950年至1953年出版的关于美国的论著不计其数,影响较大的有:潘光旦的《人类公敌美帝国主义》(华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金岳霖的《从堕落到反动的美国文化》(开明书店1951年版)、曹孚的《腐朽反动的美国文化》(开明书店1952年版)等。这些文章和著作既对美国社会内部作了透视,又对美国罪行作了控诉,其主要目的是为揭示美国侵略的本质寻找历史与现实的证据,为“诤议”美国侵略“正视听”,为证实美国“腐朽堕落”全盘否定美国文化。作为理论宣传和教育活动的主体,知识分子参与美国负面形象的建构,无疑起到了现身说法作用,尤其是许多著名教授参与其中,对大众更有说服力,而这对教授们也是一个典型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过程。知识分子通过理论的建构,使得自己的美国观念被纳入意识形态的规范。

如果说上述活动使知识分子的改造仍处于温和的教育阶段的话,抗美援朝中收回教育主权、控诉美国文化侵略等实际行动,则把部分知识分子的改造推向思想斗争阶段。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清算美国文化的影响,新政权很快接办了由外国津贴的教会学校。1950年底,全国接受了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20所<sup>[18]31</sup>,美籍校董在学校的各种行政职务均被解除,一些美籍教师被辞退。到1952年,大多数外籍教师和行政管理员已离开中国。<sup>[19]20</sup>对教会学校办学权的收回,从“物理上”隔断了知识分子与美国的文化联系,为清算美国文化奠定了基础。随之,在教会学校内部,学生开展了控诉“美帝国主义”的活动,教师则重点开展了自我批判运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等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纷纷通过展览会、讲演会、控诉会,或公开揭露美国利用文化教育机构“侵略”中国的事实,或批判自己“亲美”“崇美”的行为与思想。<sup>[20]49-50</sup>而学生的反美控诉运动则把知识界的抗美援朝活动推向了高潮。1950年11月,中共南京市委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两个教会学校为重点,针对美籍教授的个别言论,开展了一场全市学生反侮

辱、反诽谤控诉运动。毛泽东对南京学生的反美运动经验高度重视,并要求各大城市参照、借鉴。<sup>[21]718</sup>在中共中央的推动下,运动波及全国各大中城市。据统计,全国20个大城市的教会团体、学校、医院和留学生等700多个单位约20万人,参加了此次反“美帝”文化侵略的运动。<sup>[22]654</sup>

抗美援朝运动进入高潮后,知识分子也纷纷参与了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参军参干、捐献飞机大炮、签订爱国公约等运动。以“参军参干运动”为例,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7月,中共中央先后三次大规模动员全国青年报考军队院校。教师们广泛参与了青年学生参军的动员工作。如南京各大中学校的教师运用各种方法说服学生和家,鼓励学生去报名。许多教师还亲自动员子女参军参干,有的把两个或三个孩子一起送去报名参军。<sup>[23]</sup>南京大学教授方光焘不仅送儿子参军,还批评了他儿子参军只想当空军的“个人主义”思想。<sup>[24]</sup>苏南文学院的刘百川带头送子参军,成为模范。<sup>[25]</sup>知识分子对参军参干等爱国运动的参与,并不见得对支援朝鲜战争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却是知识分子确立民族国家立场的重要实践,不仅激发了知识分子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更构成了对知识分子超政治超阶级态度的考验。

从组织知识分子学习时事到参加宣传活动,从开展反美控诉运动到参与参军参干、捐献、订公约等爱国行动,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从温和的政治教育进入到具有批判意味的思想斗争,从理论层面的学习进入到社会实践的考验。这些运动既蕴含了用阶级观念审视美国的唯物史观,也包含了国际主义的新爱国主义等价值规范,对许多抱有超政治超阶级态度的知识分子而言,抗美援朝运动无疑是确立自己“反美思想”的重要实践,也是对他们能否从唯物史观和新爱国主义角度认识美国的一次考验。另外,反美的社会实践也比较适合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知识分子本身既是现代性的追求者,也是民族主义的追求者,他们多数并不了解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存有疑惧,但却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传统,都痛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腐败。因此,在战争情境下,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一方面增强了知识分子反美的民族主义道德义务感,另一方面,“爱国必须反美”的新式爱国主义话语,也使知识分子面临强大的政治压力,抗美援朝运动由此成为新政权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重要平台。

### 三、抗美援朝运动对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

作为一场反美爱国的社会动员,抗美援朝运动首先达到了在知识分子中迅速清算美国文化影响的效果,而“这在平时恐怕要几十年才能做到”<sup>[26]87</sup>;同时,反美爱国的社会动员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营造了浓厚的政治氛围。

#### (一) 抗美援朝运动规范了知识分子对美国的认知,使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划清了同美国的界线

抗美援朝中,有关美国的一切权威表达经过反复强化,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站稳政治立场的标识。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放弃原来超政治超阶级的“第三者”态度,主动从民族立场出发,在理论宣传或检讨中与美国划清界线。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在燕京大学由人民政府接受前,认为燕大的主要问题,不是美国利用文化教育进行政治与经济侵略,而只是传播美国的生活方式;甚至公开声明他轻视美帝,可不痛恨美帝,因为他从来不痛恨任何人、任何阶级。1951年2月,燕京大学由人民政府接办后,陆志韦对美国的批判力度开始加大,认为“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中间的恶霸”,对于人民政府接办学校,“我个人的快乐是说不出的,美帝让我把一件长满了虱子的衣裳脱下来了,比我从日军监狱出来的那一天还觉轻松自在”。<sup>[27]</sup>原先他认为司徒雷登并不是跟美国国务院表里为奸的特务头子,但后来专门发表文章,揭露司徒雷登与反动势力勾结、把握校政的历史。<sup>[28]</sup>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曾经想走“第三条道路”,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展时还曾抵制,但后来在强大政治压力下也开始与美国划清界线。<sup>①</sup>北京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人民日报》撰文称,美国从来就是我们的敌人,如果现在还有人美国存有幻想,“那除了是白痴,只好就是愚蠢;不然就是甘心为虎作倀的反动派,或者是美帝国主义希望利用的民主个人主义者”。<sup>[29]</sup>蔡尚思教授坦承:中美之间的战争已经发生,就是从爱国主义的角度也应该重新认识美国,“历史事实既然告诉我们:美帝和祖国、美帝和正义都不两立,那么如真为着正义,为着祖国,就必自恨美帝始;如不恨美帝,就是思想有问题,神经有问题”。<sup>[30]14</sup>当然,也有些知识分子对“三视”美国存有质疑,但在反美爱国的政治氛围中,知识分子除了接受政治化的美国观念外,不可能再有其他声音。1950年11月1日,陆定一在南京的一次报告会上提出“美国没文化”这一观点时,引起了南京

<sup>①</sup> 吴贻芳在运动初期曾不愿在反对奥斯汀宣言上签名,结果被认为是“要准备另搞一套”,经孤立后迅速签了名。参见:共青团南京市青委:《南京市学生反美爱国运动总结报告》(1950年),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案号6002-1-2。

知识界的强烈反响。<sup>[31]107-108</sup> 南京大学一些教师对这一提法表示质疑甚至反感。但到 1951 年 4 月,在听了志愿军代表的报告后,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韩儒林说:“现在我完全了解美国侵略者是蒙人皮的野兽,确实没有文化。陆部长报告如在今天来做,再也不会有人不满了。”<sup>[32]175</sup> 知识分子对“美国没文化”等有关美国的一切权威表达的接受,显然是受了抗美援朝政治氛围的强烈影响所致。“不反美就是民族的敌人”,自然给知识界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在学校,甚至劝学生读书,不参加反美活动,也“将犯‘阻碍进步,破坏团结,反对参军,援助美帝’之嫌疑”。<sup>[33]38</sup> 显然,经过抗美援朝运动,社会上已经没有了为美国叫好甚至不反美的政治空间。在批判超阶级超政治的形势下,不少人对任何有关美国的联系都作了检讨。南京大学一位教授曾珍藏一把美国“荣誉科学会”赠送的“金钥匙”,一直引以为荣,反美运动开展后,却认为“十分可耻”而气愤地扔到厕所里。<sup>[34]</sup>

## (二) 抗美援朝运动割断了知识分子与美国的联系,清算了部分知识分子的“亲美”“崇美”思想

对教会学校的收回过程,就是对美国文化影响的大扫荡。在接收外国津贴的高校时,教育部门提出要“集中火力,肃清美帝文化侵略的影响”<sup>[18]35</sup>,“从思想上斩草除根”<sup>[35]3-4</sup>。根据教育部门的要求,高校教师尤其是教会大学的教师,联系实际,对照“三视”教育的权力话语,初步检讨了自己的思想。曾任金陵大学园艺系园艺试验场主任的李家文教授,沉痛地揭露自己一直为美国人布置花园和供应所需要的蔬菜,甘心为他们服务而不自愧,这是他受美帝文化毒害的结果,承认“我这三十多年以来所作所为,好比唱了一出丑角戏,是一个沉痛的悲剧”。<sup>[36]</sup> 科学院的萧前椿在南京教育科学工作者举行的一次控诉会上检讨说,他在美国读书时,曾帮助过美国的大学绘制中国矿产图,原以为纯粹用于学术研究,后来才知道是用于军事目的,因此他痛心地说:“今天美帝侵略火焰烧到东北门口,我对人民祖国犯了罪(语至此,哽咽落泪),我愿在今后工作中赎罪。”<sup>[37]</sup> 燕京大学社会系严景耀教授检讨了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工部局做事的历史,流着眼泪说:“我过去一直自以为是进步的教授,最近才发觉自己多少年做了美国文化侵略的俘虏”,“我不仅自己深受美帝的毒害,而且还把这些毒素传播给青年,这是多么沉重的罪恶”。<sup>[38]226</sup> 一直在教会学校上学、后又留学美国的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控诉了自己由美国回国在租界办学的经历,提出租界里的教育就是“奴化教育”,“帝国主义办这种学校的目的是为洋行培养书记、打字员……总之是培养为他们服务的奴才”。<sup>[39]</sup> 部分教会学校教师对自己思想的检讨,虽然不一定达到思想认识层面,但已经表明他们不再持超阶级超政治的态度,知识分子原有的“美国经验”逐渐成为他们“罪感”意识的一部分,为进一步改造他们的思想奠定了基础。<sup>①</sup>

## (三) 抗美援朝运动使知识分子思想受到洗礼,由衷地认识到改造自己思想的必要

在抗美援朝时事学习与宣传活动中,不少知识分子承认自己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季羨林在参加抗美援朝时事学习两周后,针对当时有人认为停课学习时事是得不偿失的说法,指出:学习时事不仅没有妨碍正常的学习,反而学习得更多。他承认,最初大家都认为是“要替别人打通思想,把抗美援朝的意义向别人解释”,没想到在工作中却发现自己还有许多模糊观念,因此,“在工作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帮助别人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同时也解决了自己许多思想问题”。<sup>[11]17</sup> 北京大学植物系的张景钺在参与抗美援朝宣传后,认识到为了向群众宣传,首先自己要能够“衷心的、彻底的仇视、鄙视、蔑视美帝”,他认为自己在这次运动中“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并提出“我们知识分子,若是以前还存着若干亲美、恐美、崇美的思想,那么,通过这次运动就必须将它彻底消除。就我个人来说,经过这次运动,我已体会到进一步的思想改造,而我相信我决不是一个孤独的例子”。<sup>[11]15</sup> 教授李颂琛坦率地承认,抗美援朝运动对他来说,“上的是实际行动的实习课程”,通过这次运动,他“由个人思想改造问题,进而比较真切体会到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意义”。<sup>[11]21</sup>

应该说,面对热火朝天的群众性抗美援朝运动,知识分子由衷地意识到自己思想改造的必要。抗美援朝有效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思想情绪,广大教师对抗美援朝的热情参与是真心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仅在政治上倾向共产党,而且普遍认同了新政权关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诠释。

但是,如果说知识分子由此对美国的认识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也是不现实的。他们的一系列感想与体会,既有对祖国的真诚热爱,也有政治表态的成分。西南师范学院的吴宓承认,他在时事小组学习会上的发言乃“循例随众,不得不言,既违良心,又不合时宜,殊自愧自恨也”<sup>[33]24-25</sup>。尽管这可能是一个特例,但从常识来说,要改变知识界在思想上对美国的看法,显然在短时期内是很难奏效的。真正让知识分子在思想层面认同新政权的价值体系,还需要进一步清理大多数知识分子个人的思想。由于这一时期中共还

<sup>①</sup> 参见李巧宁:《改造中的知识分子——谈知识分子的罪感认识》,载《社会科学论坛》2003 年第 9 期,第 59—63 页。作者认为“罪感”是知识分子产生改造欲望的前提,是他们能在不断地被改造过程中诚心投入的心理基础。

是在反帝反封建目标下以团结教育知识分子为主,除了极个别与美国关系很深的知识分子受到思想上的批判外,知识分子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中接受教育改造,主要是自愿参加,大部分知识分子并没有感受到政治压力。狂风暴雨式的大规模个人思想清算是通过由 1951 年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实现的。

#### 四、抗美援朝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发起与运作

思想改造运动是专门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政治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于 1951 年 9 月由北京大学首先开始,逐渐波及全国。有研究者以京津高校教师改造运动为例,从时间上划分四个阶段:动员学习阶段(1951 年 9 月至 1952 年 1 月);“三反”与“洗澡”运动阶段(1952 年 1 月至 5 月);组织清理与“忠诚老实运动”阶段(1952 年 5 月至 6 月);院系调整阶段(1952 年 6 月至 9 月)。<sup>[40]47</sup> 这四个阶段大致体现了思想改造运动的运作过程。思想改造运动与前述知识分子教育改造方式明显不同,采取了思想批判、群众斗争、“洗澡”“过关”、组织清理等方式,对知识分子形成了压力很大的政治环境。张济顺提出“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这一概念,详细具体地分析了运动中思想改造的基本运作程序,解释了知识分子一旦进入了意识形态权力运作的网络,思想改造是怎样达到预定的成效的。<sup>[15]195-198</sup> 正是在权力运作下,运动过后,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乃至情感都经历了一番洗练。也就是说,以前的教育改造,实际上并没有进入思想层面,只有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才真正受到冲击。思想改造运动无论是其缘起、运作方式,还是改造内容,都同抗美援朝密切相关。

抗美援朝战局的稳定和国内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中共启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因素。1951 年 9 月至 10 月,志愿军取得了秋季防御作战的胜利,朝鲜战局稳定下来。为了进一步抗美援朝,毛泽东开始考虑将国家财政开支的重点由国防转入经济建设。<sup>[41]235</sup> 经济建设需要知识分子参与,但在中共看来,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后才能使用。对此,早在 1951 年 8 月 22 日,周恩来就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新中国无论是国防建设,还是巩固政权方面,都需要人才,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因此,要让他们能够为新中国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sup>[42]175</sup> 然而,前述知识分子的改造远未达到新政权的目标,中共非常清楚,知识分子虽然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政治认识水平和政治觉悟得到了提高,政治上也基本认同了新政权,但在思想深处,他们亲美、崇美的观念仍根深蒂固,仍然留恋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念。1951 年 5 月文艺界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传达出中共对知识界的思想状况仍然不满的信息。1952 年,《人民教育》发表社论,强调高校教师中仍存在着“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崇拜英美的买办思想”等,并称“这些思想在顽强地抗拒工人阶级的思想的领导”。<sup>[43]</sup> 鉴于知识分子改造目标尚未达到理想效果,而国家建设又急需知识分子的参与,1951 年 10 月 23 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强调:“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sup>[6]184</sup>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推动下,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很快展开。显然,1951 年思想改造运动的发起,是抗美援朝战争稳定后,中共争取知识分子参与经济建设以支援抗美援朝的迫切需要。

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及其对国内社会改革的推动,为思想改造运动的发起创造了条件。1951 年 11 月,镇压反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同年底,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也基本完成。三大运动的胜利使毛泽东认为对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已经到来。对此,毛泽东曾分析指出,1950 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提出“不要四面出击”,是因为“有台湾敌人的轰炸、封锁,土改与镇反工作急待去做”,需要团结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进攻。但由于抗美援朝战争有大量加工订货,赚了钱的资产阶级开始“盛气凌人”,向新政权“猖狂进攻”,“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sup>[44]173</sup> 毛泽东讲的“已到时候”,就是指三大运动的胜利。毛泽东曾经明确地指出:“三反、五反只能在去年上半年搞,因为那时我们在朝鲜战场上打得很好,战线稳定,土改基本完成,镇反基本结束,而资产阶级的尾巴翘得很高,必须打下去,如果搞早了反而不利。”<sup>[45]223</sup> 在毛泽东看来,1952 年已“天下大定”,不再担心社会震动,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那种温和谨慎的政策既然不能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集中力量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就成为可能之举。于是,知识分子改造不再以团结教育为主,而是以改造为主,无论是“三反”“五反”,还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虽然在人民内部进行,但在解释上则是阶级斗争的延伸。<sup>①</sup> 这种带有阶级斗争意味的改造之所以可能,显然是

<sup>①</sup> 1952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中,要求各级党委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参见毛泽东:《关于“三反”、“五反”》,载《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2 页。

建立在抗美援朝等运动顺利开展的基础之上。

抗美援朝“三视”教育重塑的美国观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成为清算知识分子阶级观念的重要内容。经过抗美援朝“三视”教育,美国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烙印无疑成了知识分子的“政治污点”、“政治瑕疵”,这使得权力化的美国认知成了批判知识分子个人思想的工具。思想改造运动中,有的知识分子从家庭出身与教育环境检讨了自己“亲美”思想的阶级根源。金陵大学数学系主任叶南熏提出,他“崇拜美国”是因为他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曾留学日本,是父亲的言行“毒害”了他,“作学生的时候,所听到的,所见到的,都是美国好”,促进了他亲美、崇美思想的形成。<sup>[46]81-82</sup>胡思杜在批判他父亲胡适时提出:他父亲“甘做帝国主义工具”,皆因为他父亲“出自没落的官僚士绅之家”,1910年去美国后,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他父亲迅速被征服,立场逐渐转移到资产阶级。<sup>[47]205</sup>钱伟长教授在批判自己“企图把清华大学办成美国麻省理工大学那样水平的学校”的思想时,也检讨说这是他的思想“深受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毒害”。<sup>[48]83</sup>有的教授联系自己的专业与教育思想,从政治立场上批判自己超阶级、超政治的态度。典型的例子是有过留美经历的应用物理学家葛庭燧,他检查了自己盲目崇拜美国科学技术的思想根源在于“没有仔细分析它究竟是掌握在谁的手里”,承认经过学习,终于认识到原子弹和雷达等科学技术“如果被掌握在反动阶级手里,那只是有害而无利的”。<sup>[49]20</sup>西北大学地理系教授夏开儒大力批判了自己“技术第一”、“研究第一”的超政治、超阶级的错误思想,承认自己“无条件的崇拜英文书,常常怀念美国的‘地形学’和‘地质学’杂志,大有‘几月不见英文杂志,如丧考妣’之感”。<sup>[50]24</sup>即使已经在政治上告别了美国、靠拢了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也从阶级视域再度检查了思想深处残存的崇美意识。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钱端升,自以为解放以来“一心一意地在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现在才知道自己“大大地错了”,因为自己旧的思想仍然没有清除掉。于是,他除了检讨自己“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旧思想是怎样作祟”外,还批判了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的“所谓‘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sup>[51]48-52</sup>

从联系家庭出身审视知识分子美国观的阶级根源,到联系超阶级观点批判知识分子看待美国的错误态度,中共正是通过抗美援朝浓烈的反美气氛,把批判美国观作为媒介向知识界传递阶级观念。知识分子美国观的改造过程就是在知识分子中确立阶级斗争与阶级意识的过程。在抗美援朝反美爱国的声浪下,知识分子原有的“美国经验”已经成为他们“罪感”意识的一部分,意识形态规范化的美国观念逐渐成为改造知识分子的“道德制高点”。即使是怀着民族主义情感回国服务的知识分子,也开始用阶级的观点重新审视自己的民族主义究竟从属于哪一个阶级的立场。同时,基于“反美就是爱国,爱国就是反美”的逻辑,知识分子如果不能不用阶级立场审视自己的美国观念,就有可能沦为美国政府在白皮书中寄予很大希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民族主义曾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话语,在统一美国观时,将民族主义归属于阶级斗争范畴,实际上就是通过利用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心理基础与情绪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整合。在通过阶级立场全面审视美国观时,百年来民族独立的目标与现实的政治结合起来,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情绪的释放中,身上的“个人主义与民主主义”得到全面改造,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审视自己的行为规范,开始普遍适应新政权所提倡的集体主义、国际主义等爱国主义新话语。

很难估量思想改造对中国知识分子真实思想的影响,然而,他们同中共站到一起,并不完全是出于政治压力。知识分子曾经有的反美情绪、朝鲜战争的爆发等,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敌意。此外,知识分子对人民政府努力重建社会的支持,也可能增强了他们对中共谴责美帝的支持。不管知识分子是否真正对美国产生了憎恨,中国知识分子经历思想改造后,都显得更加热情地支持中共。对于这种建立在民族主义心理基础上成功的整合,国外学者也吃惊不已。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见到中国知识分子似乎纷纷走向中国共产主义一边,感触颇深,他批评了那种“认为由莫斯科制造的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的情绪是互不相容”的错误看法,他和其他美国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承认,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变化“标志着某种比简单的强迫归顺更为深刻的东西”,“它象征着共产主义在思想上的胜利”。<sup>[52]133-134</sup>

##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知识分子教育改造过程中,抗美援朝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使知识分子的改造由谨慎走向急迫,由松散的政治学习转为组织化的政治教育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抗美援朝运动规范了知识分子对美国的认识,割断了他们与美国的文化联系,从政治和文化层面清算了美国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营造了浓厚的政治氛围;1951年秋,抗美援朝的顺利进展及其引起的国内形势变化,既向中共提出了发起思想改造运动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也为中共从思想层面改造知

识分子提供了条件,中共最终通过思想改造运动,结合批判知识分子的美利坚观,使知识分子从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思想层面认同了自己的执政地位及其意识形态。

抗美援朝之所以能够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进程,是因为:一方面,战争的发生既使改造知识分子思想成为内在的需要,又为改造知识分子提供了条件。以美国为主要对手战争,使清算美国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成为内在需求;战争的发生,掩盖了阶级斗争激烈的气氛,使知识分子接受阶级斗争教育成为可能;战争的胜利,巩固了新生政权,又为进一步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从教育与改造内容上讲,美国观的重塑与美国文化的全面清算,始终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内容。知识分子本身就有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与经历,这使得知识分子很容易在政治上认同新政权关于认知美国的权威要求,确立反美的政治立场。从规范知识分子对美国的认识,到批判知识分子错误的美国观,再到通过批判错误的美国观清算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观念,中共对知识分子思想整合的成功,既建立在把民族主义融入阶级范畴的“反美就是爱国、爱国必须反美”的政治逻辑上,也建立在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心理基础上。

抗美援朝加快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进程的事实与内在逻辑表明,朝鲜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影响深远。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加快了国内民主革命和社会改造进程,而新政权的巩固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也加快了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提早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讲,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后来不断出现“快”的第一推动力。深化对新中国发展历史进程的研究,不能不注意抗美援朝在加速社会改造进程上的作用。这个研究也表明,近代以来社会动员决定社会发展的趋势与方向,而以爱国主义为内容的战争动员更是推进社会政治转型的重要力量。国际关系的紧张往往会引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如何正确引导民族主义情绪为爱国主义,从而达到社会动员的效果,抗美援朝时期的社会动员经验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1] 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1953-02-05(1).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6]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7] 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M].上海:三联书店,1995.
- [8] 吴建国.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风云录[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
- [9]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党的宣传工作文件选编(1949-1992)[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 [10]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宣传委员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M].1950.
- [11] 北京大学反美侵略会.北大抗美援朝运动特辑:第2集[M].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1.
- [12] 南大千余师生昨日分赴街头及郊区通过各种方式激发群众仇美情绪[N].新华日报,1950-12-03(1).
- [13] 南大教授同学连日出动爱国宣传深入街巷[N].新华日报,1950-12-04(1).
- [14]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资料汇编[G].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
- [15] 张济顺.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利坚观(1943-1953)[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 [16] 刘少奇.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N].人民日报,1948-11-07(1).
- [17]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怎样在城市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 [18]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 [19] 李扬.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与社会变迁——院系调整研究之一[J].开放时代,2004(5).
- [20] 五个月来各级学校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J].人民教育,1951,3(1).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 [22] 反对美帝文化侵略运动[J].新华月报,1951,3(3).
- [23] 爱国青年投考军校涌现无数光荣人家[N].新华日报,1950-12-18(1).
- [24] 巩固爱国思想安定学习情绪各系纷纷举行座谈会[N].南大生活,1950-12-23(1).
- [25] 苏南区党委宣传部.关于抗美援朝运动的初步总结(1951-2-28)[B].南京:江苏省档案馆,档案号3193-2-106.
- [26]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27] 处理接受外国津贴高等学校会议各地代表一致热烈拥护政务院决定[N].人民日报,1951-01-26(3).
- [28] 陆志韦.燕京大学受到的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J].光明日报,1951-02-13(3).

- [29] 陈垣. 美国从来就是我们的敌人——四十五年前的回忆[N]. 人民日报, 1950-12-08(3).
- [30] 中国教育工会上海市委员会. 从各方面看美帝[M]. 上海: 棠棣出版社, 1950.
- [31] 新华社. 内部参考[G]. 1950-11-23, 276号.
- [32]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等. 抗美援朝运动在江苏[M].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7.
- [33] 吴宓. 吴宓日记续编(1949-1953): 第1卷[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6.
- [34] 南京市人民政府四五六月份工作综合报告(1952年8月7日)[B]. 南京: 南京市档案馆, 档案号 5003-3-205.
- [35] 曾昭抡. 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是当前文化战线上的中心任务[J]. 新观察, 1951, 2(3).
- [36] 李家文. 美帝文化侵略给我的毒害[N]. 新华日报, 1951-01-18(2).
- [37] 南京教育科学工作者根据在美亲身经历控诉美帝侵略中国罪行[N]. 人民日报, 1950-11-13(2).
- [38] 陈远. 燕京大学 1919-1952[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 [39] 方延明. 与世纪同行: 南京大学百年老新闻 1902-2001[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40] 崔晓麟. 重塑与思考: 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 [41] 徐焰. 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3.
-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上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 [43] 高等学校教师必须通过“三反”运动认真改造思想[J]. 人民教育, 1952(4).
- [44]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 上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 [45] 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传(1949-1976)(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 [46] 教师们的思想改造[M]. 上海: 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2.
- [47] 胡思杜. 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J]. 中国青年, 1951(56).
- [48] 光明日报社. 思想改造文选: 第4集[M]. 北京: 光明日报社, 1952.
- [49] 光明日报社. 思想改造文选: 第2集[M]. 北京: 光明日报社, 1952.
- [50] 光明日报社. 思想改造文选: 第5集[M]. 北京: 光明日报社, 1952.
- [51] 光明日报社. 思想改造文选: 第1集[M]. 北京: 光明日报社, 1952.
- [52] [加]保罗·埃文斯. 费正清看中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The Education Reform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Movement of Resisting U. S. Aggression and Aiding North Korea and the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JIN Dao-liang

(The PLA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Movement of Resisting U. S. Aggression and Aiding North Korea (1950-1953) accelerated the education reform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e outbreak of the movement changed the reform of intellectuals from prudent to urgent, from loose political study to organize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fierce ideological struggle. The movement exposed and criticized the influenc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d had on the intellectuals' views. In the autumn of 1951,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he movement and the change of domestic situation brought by it not only proposed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an ideological reform but also provided conditions for this reform, which shifted the reform of the intellectuals from political to ideological dimension. From standardizing the intellectuals' views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to criticizing intellectuals' erroneous views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exposing and criticizing the intellectuals' bourgeois ideology, the successful ideological integr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based not only on the fitting of nationalism into the political logic that "patriots must unite the Soviet Union and oppose the imperialistic countries", but also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nationalism of the intellectuals.

**Key words:** the Movement of Resisting U. S. and Aiding North Korea; intellectuals; ideological reform; nationalism; social mobilization of intellectuals; nationalism; social mobilization

[责任编辑 刘文俊]